

“串连”与造反运动的扩散

谷川 真一
(神戸大学准教授)

- ◎ 原文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第 65 卷第 3 号、中国研究所、2011 年 3 月、1-16 页。
- ◎ 袁广泉 译

【概要】本文旨在探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运动如何从城市扩散到农村。经近年研究，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实际状况已越来越明确，但关于其扩散过程如何尚无实证性研究。本文将陕西省 93 县（1966 年）为例，对造反运动的扩散过程作实证性追踪，以了解城市红卫兵的“串连”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造反运动，不是因政治强人的“群众动员”或农民的“自发性造反”，而主要是通过城市红卫兵的“串连”而扩散到偏远农村的。

I 问题与假说

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一场全国性动乱，不仅发生在城市，农村也未能幸免。特别在人员牺牲方面，据称农村的损失甚至大于城市。¹但是，有关始于城市的政治运动如何扩散到农村，尚几乎无人研究，许多问题至今并不明确。²在以国土辽阔、传统上城乡与农村隔绝为特征的中国社会，³文革是以何种形式（或怎样的机制）由城市扩散到农村的，还有待研究。

有关文革扩散的研究成果极少，但大体上存在三个默认的印象或说假定。首先是，认为文革的主要原因在于精英政治，即最高领导层围绕政治理念和政策所进行的权利斗争，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理念。⁴应该说，该观点是以群众社会论的印象——具有号召能力的领导人

¹Andrew G.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74-99.

²对文革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作实证性研究的只有 R·鲍姆。他说，文革扩散形式的主要特点是由主要城市向其近郊的“衍射效应 (spill-over)”，文革对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城市近郊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而大部分偏远地区未受暴力影响。鲍姆据此做出了文革“主要是城市现象”的结论。Richard Bau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natomy of a Limited Rebellion,” in Thomas W. Robinson,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1, pp. 367-476.

³此处不禁令人想起，1989 年“天安门事件”前的学生和市民运动也仅限于城市。

⁴如加美光行编《現代中国の挫折——文化大革命の省察》，亚洲经济研究所，1985 年；加美光行著《歴史のなかの中国文化大革命》，岩波书店，2001 年；斯图尔特 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著、北村稔译《毛沢東の思想——一九四九年 / 一九四九～七六年》，苍苍社，1989 年；中嶋嶺雄著《北京烈烈——文革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讲谈社学术文库，2002 年；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毛泽东指导被动客体即群众——为潜在前提看待文革时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⁹⁸由于群众社会以精英与非精英的中间关系衰退为特征⁹⁹，故研究上可这样操作（operationa-
lize），即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政治强人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直接动员并扩大化的。

与群众社会印象形成对立的，是所谓“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¹⁰⁰的印象。这种看法认为，文革的发动使社会内部的各种利害关系表面化，导致维持现状派和打破现状派走向派系抗争。¹⁰¹发动文革为“红五类”子弟和非“红五类”子弟、共产党网络的受益者和非受益者等不同社会集团提供了“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人们分别依个人利害关系“自发地”行动起来。¹⁰²

有关文革扩散的第三个印象是网络印象¹⁰³。A·华尔德指出，文革时期工厂的派系抗争，是以围绕党的网络的对立为中心而展开的。¹⁰⁴将其用于扩散过程，即推导出如下假说：文革是

Cultural Revolution III: The Coming of the Catalysm, 1961—19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⁹⁸聚焦于国家和社会关系、而精英政治的某些研究认为，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国家政策”产生了被动、整齐划一的集团，为文革的群众运动、暴力抗争准备了条件。Xueguang Zhou,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8, No. 1 (February 1993), pp. 54-73; 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⁹⁹威廉·科恩豪泽（William Alan Kornhauser）著、辻村明译《大众社会の政治》，东京创元社，1961年。

¹⁰⁰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and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Mass Politics in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⁰¹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Autumn 1980), pp. 397-446;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杨丽君著《文化大革命と中国の社会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团的暴力行為》，御茶水书房，2003年。

¹⁰²不过，如华尔德所指出，该“社会性解释”（social interpretations）存在如下问题，即在剧烈变化的政治环境中，个人是如何找出“政治机会”，并采取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的。Andrew G. Walder,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May 2002), pp. 437-471.

¹⁰³Roger V. Gould,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6 (December 1991), pp. 716-729; “Patron-Client Ties, State Centralization, and the Whiskey Rebell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2 (September 1996), pp. 400-429;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53-194.

¹⁰⁴Andrew G.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Elizabeth J. Perry, ed.,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6.

通过某种官方网络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如后所述，此处就建立了又一假说，即文革抗争是通过红卫兵的“串连”这一网络构筑机制而扩大的。

表 1 造反的最初扩散（1966 年 6~12 月）（N=72）^①

| | 造反县数 | 距西安平均距离（km） | 位于关中平原县数比重 ^② |
|--------|----------|-------------|-------------------------|
| 6 月 | 2（0.03） | 263 | 0.50 |
| 7 月 | 0（0.03） | — | — |
| 8 月 | 26（0.39） | 156 | 0.65 |
| 9 月 | 5（0.46） | 151 | 0.60 |
| 10 月 | 7（0.56） | 156 | 0.43 |
| 11 月 | 11（0.71） | 189 | 0.18 |
| 12 月 | 11（0.86） | 281 | 0.18 |
| 无（至年底） | 10（1.00） | 194 | 0.30 |

注：出处请参照注（12）。第一列括号内为累计比重。

*1966 年陕西省 93 县中，为计量分析计，其县志未设独立章节记述文革之 18 县，以及虽有记述但时间不详的 3 县除外，故该表统计县数为 72 县。

**关中平原宝鸡、渭南、西安、咸阳 4 个地级市、39 县。

本文将陕西省 93 县（1966 年）为例，对文革如何由城市扩散到农村进行探究，^③焦点将对准纷繁复杂的“文革现象”中的“对县党委会第一次造反”这一象征性现象。^④县党委会（以下或称“党委”）当然是本文的分析单位即县级权力的中枢。考虑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动员群众肃清地方权力机构，故对县党委造反的扩大，可作衡量文革向地方、农村地区渗透程度的指标之一。此外，对县党委造反是文革的转折点，意味着运动由学校、工厂单位扩大到县。在陕西，至 1966 年底，包括地处偏远的 86% 的县都发生了对政治领导中心的造反（表 1）。运动矛头指向政治权力中枢即县党委后，各县的政治形势迅速失去稳定，运动由夺权斗争转向暴力的派系抗争局面。

II. “串连”的中介（Brokerage）作用

本文假定文革的造反运动是通过具有网络构筑功能的串连从城市扩散到农村的。“串连”本意为“依次建立联系”，文革时期曾广为流行，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以及为此

^①本文所用数据，多依 198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陕西省各县（文革时共 93 县）所编《县志》。主要事件的时间及死者人数等，则使用笔者也曾参加的斯坦福大学文革研究组所收集、整理之数据。较之其他省，陕西省各县所编县志对文革记述较详，单以字数看，是其他各省县志的约三倍（其他各省县志记述文革平均字数为 3,772 字，陕西省各县则为 10,689 字）。此为探究文革扩散过程提供了宝贵史料和数据。关于“县志数据”，请参阅前引华德·苏（Walder and Su）论文。本文以县志为主要资料，分析单位为县，文中“农村地区”非指人民公社或大队、生产队，而是指多半为农村的县及县辖区域。

^②具体而言，除县党委会本身外，对县党委书记、副书记的批判、攻击也包括在内。另，所谓“造反”，指学生、中下层干部、工人等对上述党委会及其书记、副书记等以口号、大字报、传单等形式予以批判、攻击，以及以批斗、游街、殴打、监禁等形式予以精神和肉体折磨。

而旅行各地。串连如何、何时开始不详。不过，据称毛泽东在 1966 年 6 月 10 日于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¹⁴⁴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似在谋划让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攻击中央领导部门。同年 6 月的北京，大中学生不顾禁止学生校外活动的“中央八条”¹⁴⁵而开始互相交流、批判工作组。7 月中旬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批判禁止学校间串连的工作组的做法是“镇压学生运动”。¹⁴⁶部分地方城市的教师、学生也来到北京，上告地方领导的压制状况。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下文称“中央文革”）看出这些地方来的教师、学生有利用价值，于 8 月 16 日召开“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对他们表示支持。¹⁴⁷就这样，串连以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利用北京和地方城市学生的“自发”行动的方式被概念化、制度化了。

毛泽东于 8 月 18 日接见红卫兵¹⁴⁸后，串连逐渐形成制度。接见当日夜，首都红卫兵组成的第一个“南下”团即出发去西北的西安、兰州等地，和南方的武汉、长沙、广州等地。¹⁴⁹8 月中旬至下旬，首都红卫兵在西安、天津、长沙、郑州、青岛、合肥等城市试图攻击省市党委和领导干部，遭到当地学生、工人、农民组成的“赤卫队”的反击。

另一方面，从全国各地来北京的“北上”学生日益增加，在 8 月 31 日第二次接见时，周恩来发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文简称“党中央”）将邀请全国学生和教职员来京。随后，9 月 5 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¹⁵⁰，号召地方学生为交流经验有组织地来京，同时决定交通、食宿及其他费用由政府负担。基于该通知，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招待所”，铁路、客车、客船等交通机关也挤满红卫兵，陷入瘫痪。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发《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徒步进行串连。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 10 月 28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让红卫兵全程徒步，并以冬天将至为由，要求 11 月 18 日以后让各地学生、教职员返乡。¹⁵¹另外，鉴于各地学校无学生上课，中央文革开始认为必须让学生尽早返校，以进行造反运动。¹⁵²但学生继续免费乘车，党中央、国务院于 11 月 16 日发出通知，要求至翌年 4 月前暂停串连。¹⁵³又于 3 月 19 日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¹⁵⁴

早有人指出红卫兵串连对扩大文革所发挥的作用。如严家祺和高皋在其主要研究精英阶层权力斗争的著作日文版序中指出，“一亿多红卫兵的‘大交流’，将文革狂潮带到了边境以及内地山区”。¹⁵⁵另有对上海文革的研究表明，北京的“南下”学生扩大了上海的文革，也促进了工

¹⁴⁴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79 页。

¹⁴⁵《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概要）》（1966 年 6 月 3 日），收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D-ROM），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年。

¹⁴⁶严家琪等著、辻康吾监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岩波书店，1996 年，第 31-42 页。

¹⁴⁷前引严家琪等著、辻康吾监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80 页。

¹⁴⁸此后至 11 月，毛泽东共 8 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约 1,100 万人。

¹⁴⁹陈东林等主编、加加美光行监修《中国文化大革命辞典》，中国书店，1997 年，第 460 页。

¹⁵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450 号，1966 年 9 月 5 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¹⁵¹《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 10 月 28 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¹⁵²前引严家琪等著、辻康吾监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86 页。

¹⁵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中发[66]554 号，1966 年 11 月 16 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¹⁵⁴《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中发[67]106 号，1967 年 3 月 19 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¹⁵⁵前引严家祺等著、辻康吾监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v 页。

人、学生的派系分化和组织化。²²⁸这些观点都含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是，文革从城市到农村扩散的过程怎样？在政治形势和社会结构都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农村何以能够煽动对抗？这些问题依然不明。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证方法追踪文革由城市到农村的扩散过程，并探明其机制如何。

串连可视作一种中介（brokerage）。所谓“中介”，指“在原来没有关系或关系微弱的两个以上的社会场（social sites）之间建立更直接联系”。²²⁹将被隔绝、“关系微弱”的城市和农村连接起来、到处点燃造反之火，是“毛主席的使者”红卫兵。城市的红卫兵们来到农村后，首先来到中学²³⁰（初中、高中，且红卫兵大多情况下就住在学校），向当地学生宣传城市的运动形势，煽动他们造反。所以，农村地区的造反运动，既非中央领导人通过大众媒体“直接传达”而发动，也非学生、工人及农民自发组织，而是因城市红卫兵有组织、有系统地煽动而扩大的。农村存在其固有的对立或不满，但那是内在因素，并未自发地显露出来。大部分农村居民，是通过城市红卫兵这一“中介”的煽动，才开始反对政治领导部门的。

III. 派驻工作组的政治过程

6月1日，广播上播送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即2日，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等西安的几乎所有大学都贴出大字报，教师、学生也上街游行，对学校领导干部展开批判。²³¹是日夜，中共西北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西安交大派驻工作组，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组长。²³²翌日晨两点，工作组即进驻西安交大。²³³3日，陕西省党委决定向西安交大以外的其他大学也派驻工作组，并作出五点指示，即“大字报不要贴到校外”、“不要涉及国家机密问题”、“不要到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提防坏人破坏和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²³⁴因此，4日各校暂时恢复秩序。

6月5日，西安交大工作组通过校内广播，号召可就大学党委的路线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进行讨论，招致学生反对。²³⁵西安交大再次出现大量大字报，攻击矛头不仅指向工作组，还直接对准省党委。6日，学生们在校内外贴出“工作组十大阴谋”、“十大罪状”等大字报，并喊出

²²⁸李迺著《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时报出版，1996年，第30-40页。前引杨丽君著《文化大革命と中国の社会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团的暴力行為》，第230-234页。金野纯著《中国社会と大衆動員——毛沢東時代の政治権力と民衆》，御茶水书房，2008年，第274-290页。

²²⁹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7; Charles Tilly,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1;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ns Politics*, Boulder, Col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p. 215.

²³⁰当时，陕西省各县几乎不存在高等教育机关，部分县有师范学校，但大部分县只有中学。

²³¹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4页。

²³²前引陈东林等主编、加加美光行监修《中国文化大革命辞典》，第449页。

²³³前引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下）》，第924页。

²³⁴前引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下）》，第924页。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61页。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1-672页。

²³⁵前引前引陈东林等主编、加加美光行监修《中国文化大革命辞典》，第449页。

“赶走工作组”、“深挖省党委会、西北局黑线”等口号。³³⁴他们围住严克伦试图辩论，同时闯到西北局和省党委。此即西安交大的“6·6事件”。

6月9日，省党委增加西安交大工作组的人数，改称工作团，重新任命严克伦为团长，同时成立工作团党委。工作团着手恢复和加强秩序，并对部分学生进行批判和审查。18日，《陕西日报》发表社论，称西安交大“6·6事件”是“反革命反扑”。受工作团批判的学生李世英（后来的“东派”头目）自杀未遂。³³⁵

不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西安交大“6·6事件”对省内各县的影响并不大。该时期虽有学生把批判矛头指向学校干部，却极少批判县党委。据县志记载，6月仅有两县发生对县党委的造反（表1）。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之一发生在省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榆林县。《人民日报》转登聂等人大字报的6月2日，榆林中学的学生12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题为“榆林地委是个大黑店”。³³⁶但该动向并未波及周围各县。另外，6月19日，在西安北方70公里的耀县，有家在当地的西安交大学生3人“回乡点火”，张贴“炮轰县委”的大字报。³³⁷但除此以外，并不见学生走出校园并批判县党委。由此观之，6月份发生的造反有其特殊背景，比如与西安的大学生有关等。在大部分县，学生的活动都在校内，而且处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之下。

各县中学的学生开始激烈批判学校的党组织和干部，是在工作组进驻之后。在陕西各县，6月中旬前后，工作组纷纷被派驻学校及其他文教单位。³³⁸但在工作组进驻前，学生和学校干部的冲突并未激化，派驻工作组应不是为应对学校内冲突，而是按上级指示行事。在北京、西安等地，派驻工作组确为应对校内对立激化，³³⁹但陕西各县却是在学生和学校干部冲突激化以前按上级指示办事。许多情况下，学生是在工作组进驻后受到促动才开始攻击学校领导干部。工作组派驻的过程，大城市和地方各县大不相同。

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主导了学生对教师和学校干部的批斗。工作组由数名至十数名党政机关干部组成，³⁴⁰组长由县长、副县长、县党委副书记、教育局长、宣传部长等担任。工作组按阶级成分、对文革的态度等将教师、学生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组织“左派”学生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³⁴¹揭发教师和学校干部。如某校有教师、学生639名，其中被划为“左派”的只有143名（学生只选出“左派”，不再分“中间派”和“右派”），教师的“左派”仅9名，“中间派”20名，“右派”8名。³⁴²批斗目标是那些被认为教学、生活上有问题的“出身不好”的教师和学

³³⁴前引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下）》，第924页。

³³⁵前引前引陈东林等主编、加加美光行监修《中国文化大革命辞典》，第449页。

³³⁶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77页。当时，榆林县党委会由地区党委会组织的“社教总团”代行政务，这或许是学生未批判县党委会，而批判地区党委会的原因。

³³⁷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耀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78页。

³³⁸据县志记载，省内最早派驻工作组的是延安地区的富县（6月2日），最晚的是渭南地区的耀县（7月12日）。

³³⁹关于北京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请参阅前引Walder，“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pp.

443-451；前引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7-31；张承志著、小島晋治等译《紅衛兵の時代》，岩波书店，1992年，第62-81页。

³⁴⁰工作组人数似依学校大小而定。但也有例外，如派驻子长县子长中学的工作组，开始仅3人，但两周后增至30人。子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长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8页。

³⁴¹“多提意见，大胆发表意见，大量张贴大字报”之意，再加上“大辩论”，称作“四大”。

³⁴²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6页。

校干部。为让学生了解教师、干部的问题，有的工作组甚至公布档案。⁴⁴³但同时工作组也限制学生“大字报不上街，内外有别，不上街开会、游行”。⁴⁴⁴

在部分县，也出现过北京、西安那样中学生反抗工作组的情况。在渭南地区华县，县教育局率领的工作组于6月下旬进驻咸林中学后，即把学校党支部赶到一边，开始限制学生的活动。某学生张贴大字报揭发班主任问题后，受到工作组批评。该生十分不满，又贴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大字报。学生和教师得知工作组私下将该学生定为“右派”后，即起而反对。⁴⁴⁵另在榆林地区子洲县，双湖峪中学数名学生于7月中旬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后，工作组马上组织忠于工作组的学生、教师，对表示反抗的学生挨个批斗。⁴⁴⁶

但是，这都是个例，在其他大部分县，8月中旬以前并不见有报告称学生和工作组发生对抗。对工作组的批判开始扩大，是在8月9“16条”公布、工作组撤出以后。另如后述，部分县违背省党委指示，8月以后仍继续让工作组留驻。派驻工作组，本来就与城市不同，是根据上级机关的指示在学生与学校领导干部并未发生严重冲突时派驻的，而其撤出，也并非学生与工作组发生了严重对抗，也是上级指示的结果。学生甚至可能把工作组突然撤走，看作是其发觉了“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

在这些县，学生与工作组的对立并未扩大的另一理由是，教师去参加“夏期教师集训会”（以下简称“集训”）而无法与学生接触。暑假开始后的7月中旬以后，陕西省各县所有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一处监禁数月，并遭到各种迫害。详情此处从略，总之，通过集训，教师和学校干部与具有反抗情绪的学生被隔离开来，从而更便于县当局在可控环境下进行政治运动。因此，在工作组进驻学校的6至7月，大部分县学生和工作组的矛盾并不严重，县党委也未受到批判。可以说，至8月中旬，各县文革基本上是在县党委（或社教工作团）主导下进行的。

IV 造反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66年8月）

7月24日，毛泽东批判禁止向学校派驻工作组、禁止串连的做法是“压制学生”。⁴⁴⁷8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十一中全会）上，在毛泽东强有力主导下，通过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翌日公布），宣告全面开展文革。⁴⁴⁸“16条”不仅把批判矛头由“反动学术权威”转向“走资派”（第1条），还严厉指责工作组压制具有反抗精神的学生，称除杀人、破坏等明显违法行为外，对学生不应施加任何惩罚（第7条）。其意图是，通过全面否定派驻工作组而解放学生，将攻击矛头引向派遣工作组的当事者，即地方党领导。

中央突然转换方向，使地方领导们不知所措。地方领导干部根据上级指示派驻工作组，

⁴⁴³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8-589页。

⁴⁴⁴前引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第576页。

⁴⁴⁵《华县志·“文化大革命”志》（编著者不详，未刊稿），第5-6页。

⁴⁴⁶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洲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8页。

⁴⁴⁷ Roder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3-84; 毛泽东著、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译《毛泽东思想万岁（下）》，三一书房，1975年，第346-348页。禁止向学校派驻工作组、禁止“串连”这两个措施，后来被批判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⁴⁴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现在却被指为“方向、路线的错误”，不得不遵命将其撤回。8月3日，西北局、陕西省委宣布撤回工作组，第二天，西安大街上就贴出批判学校党委和省党委的大字报，到处都发生批判“走资派”的斗争。⁴⁹⁴在县级，围绕撤回工作组的措施并不一致。如榆林地区，榆林县8月6日决定撤回工作组，⁴⁹⁵但其他县并未立刻撤回。府谷县党委书记在8月中旬出席西北局会议后，在常委会上突然发言称“进驻府中的工作组，要承担执行‘资反路线’的责任”，让与会者大惑不解。⁴⁹⁶20日，按省委电话指示，府谷中学工作组面对全校师生作自我批判。直到23日，留下巡视员、观察员、联络员各一人，工作组才撤回。米脂、绥德二县分别到10月、11月才撤回工作组。⁴⁹⁷这些县的领导干部未撤工作组，或许认为没有必要。由此可知，不少县学生和工作组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而对中央在工作组问题上忽然转向，县领导班子则一时跟不上。

陕西省县城最早对县党委造反的，是西安市近郊县。如前所述，8月4日以后，西安已开始攻击工作组和省党委。从10日前后，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陕工大）等大学学生已通过向邻近县的中学、师范学校等寄送信件、资料，或直接前往交流经验等方式，开始煽动造反。⁴⁹⁸8月13日，西安交大学生来到西安东临的临潼县华清中学，对学生、教师进行煽动。学生们把工作组组长押送到县委，连县委书记、副书记一起批斗。⁴⁹⁹同日，西安西北约60公里的礼泉县，有家在当地的西安交大、西北大学学生组织的“打回礼泉战斗队”与当地中学生进行串连。他们和当地中学生一起，在县里最早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并攻击教师集训会。⁵⁰⁰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后，西安近郊的造反运动趋于激烈。同日，受接见的北京部分红卫兵向西安等各地出发，开始进行“大串连”。翌日即19日抵达西安的，是北京军政学校、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北京市第八中学、育英中学等校的学生。⁵⁰¹据称，至8月29日起的十余天内，从北京等省外来到西安的学生达一万多人。北京学生与当地学生一起，攻击了省党委、西北局和陕西日报社。

北京红卫兵的到来，也影响到西安近郊各县。在西安西北约70公里的乾县，8月中旬有北京红卫兵和西安交大学生煽动，教师集训会立即组织教师予以围攻。⁵⁰²25日，乾县师范、乾县一中的学生上街游行，张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炮轰乾县党委”等大字报。28日，当地居民和集训会教师围住正在街上鼓动造反的学生，造成大规模冲突。翌日，人民公社组织的农民队伍上街游行，反对学生造反；同时，县内各地都发生农民围攻学生的事件。据说，为此，咸阳地区党委曾要求乾县党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此类事件。

城市学生进行串连的行程越来越远。8月29日，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中的两名学生在西安东北约120公里的彬县峻使中学生到校外去造反。⁵⁰³他们在县党委门前静坐，称县党委利用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矛头直指县党委。就这样，通过串连，造反运动由西安近郊逐渐向周围扩散开去。

⁴⁹⁴前引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政务志》，第672页。

⁴⁹⁵前引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第477页。

⁴⁹⁶前引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第576页。

⁴⁹⁷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9页。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绥德县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814页。

⁴⁹⁸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县志》（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9-710页。

⁴⁹⁹陕西省临潼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2页。

⁵⁰⁰礼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礼泉县志》，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993、995页。

⁵⁰¹前引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大事记》，第462页。

⁵⁰²乾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乾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0页。

⁵⁰³彬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彬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9页。

该时期的造反运动多发生在西安近郊，但部分偏远地区也有发生。偏远地区发生造反运动似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消息灵通的学生通过媒体或“传闻”，从中央政策及北京的动向得到启发，自己寻机开始运动。如位于陕西省西南、与甘川两省交界的汉中地区宁强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在“16条”公布后即要求工作组撤走，称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革命行动、挑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④8}8月10日，县党委被迫撤回工作组，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公开作了自我批判。

另一种形式是，偏远县与西安的学生之间原本存在某种联系。比如，在西安北约400公里的米脂县，在西安有学生开始造反时，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学生恰好在该县担任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员，他们通过信件得知北京、西安的最新动向。^{④8}8月29日，参加沙家店社教工作队的学生们闯入县广播电台，强迫播送“关于火烧西北局，炮打陕西省委、榆林地委、米脂县委的号外”，震惊全县。就这样，8月，部分偏远县也有造反发生，但其背景都比较特殊。

上述所见，有县志数据可资佐证。如表1所示，对县委造反8月即达到顶峰。该月，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发生造反，这些县距西安的平均距离为156公里，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关中平原地区（包括西安、咸阳、渭南、宝鸡各地区）。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不仅距西安较近，且在省内地貌不同的三个区域（陕北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中交通最为便利，城市化程度较高。换言之，造反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是以距西安较近且交通方便的区域为中心扩展开的。

表2 最初造反主要原因（1966年8~12月）（N=60）·

| | 外发原因 | | | 内发原因 | | | 合计 |
|-------------------|--------------|-------------|-------------|-------------|-------------|-------------|--------------|
| | 县外学生煽动 | 外地返乡学生煽动 | 呼应中央动向 | 自发造反（干部） | 自发造反（学生） | 原因不详 | |
| 8~9月 (第一次高潮) | 15 (0.48) | 1 (0.03) | 3 (0.10) | 4 (0.13) | 3 (0.10) | 5 (0.16) | 31 (1.00) |
| 10~12月 (第二次高潮) | 16 (0.55) | 5 (0.17) | 1 (0.03) | 3 (0.10) | 1 (0.03) | 3 (0.10) | 29 (1.00) |

注：“主要原因”可以说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关联的。亦即，早就存在的内在原因受“串连”这一外部诱因触发而显现出来。因此，此处所谓“主要原因”并非唯一原因，而是县志着重强调的原因。总之，本文试图探究的是“造反的扩散”，造反的原因不在分析范围之内。要明确扩散的过程及其机制，须了解造反运动从某地到某地如何扩散。必须确定“主要原因”（或曰“直接原因”）是“外发”还是“内发”，理由在此。

*本文用于计量分析的样本计75件（县），其中1966年底前无造反记述者10县、有记述但时间不详者3县、7月以前已发生造反者2县除外，余60县。

从表2可知，该时期造反，约半数是来自县外学生的串连引发的。相比之下，学生或干部“自发”造反、学生呼应中央动向造反分别仅占约20%和10%。也就是说，大部分县的造反，都不是当地居民自发开始，或由强有力领导人直接动员，而是从西安、北京来交流经验的学生挑动起来。这表明，仅依靠中央大众媒体所作宣传和学生、居民的“自发性”还不够，城市红

^{④8}宁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强县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0页。

^{④9}前引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米脂县志》，第390页。

卫兵扮演“中介”角色后，才能促使农村的学生、居民对当地权力机关采取造反这一高风险的行动。以“毛主席的使者”身份出现在各县的红卫兵，主要是西安交大、西工大、西北大、西军电等西安的大学生。在当时的农村，大学生的威信较高，⁶⁵¹这对引导当地中学生向县领导干部造反，也是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仔细观察城市红卫兵的足迹可知，第一次高潮的造反，西安红卫兵引发的有 10 件，北京的有 4 件，汉中的有 3 件，宝鸡的有 1 件（表 3）。另外，8 月对县党委的造反，90% 发生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⁶⁵²可见，北京红卫兵到后，使从西安到其周围各县的串连迅速活跃起来，红卫兵的足迹是循着北京→西安（省内其他主要城市）→近郊各县的方向延伸的。换言之，造反的第一次高潮，是借助红卫兵“中介”，由主要城市向近郊分阶段、有系统地扩大的。

表 3 陕西各县煽动造反红卫兵的出发地（1966 年 6~12 月）

| | 北京 | 西安 | 汉中 | 宝鸡 | 北京以外省市 |
|----------------|----|----|----|----|--------|
| 8~9 月（第一次高潮） | 4 | 10 | 3 | 1 | 0 |
| 10~12 月（第二次高潮） | 1 | 12 | 2 | 0 | 2 |

注：有些造反由来自不同城市的红卫兵共同煽动，故数字有所重复。

城市学生的煽动，往往引发与地方干部动员的农民、工人、教员等之间的冲突。其原因应是，“16 条”公布前后，面对迅速变化的政治形势，县领导干部对中央意图一时理解不透，于是动员了那些对城市学生抱有反感的当地居民。但是，其他半数以上的县尚未受到串连的影响，使得县领导在此后数月内无需面对造反。这些县中，有的甚至未撤回工作组，就好像不知道中央政策已经改变。

造反运动经 8 月迅速扩大后，进入 9 月暂时有所缓和（表 1）。其原因大体有三。其一，中央于 9 月 14 日发出所谓“农村 5 条”⁶⁵³，以秋收临近禁止赴县以下农村串连。该禁令因三个月后的“农村 10 条”⁶⁵⁴而被取消，但暂时有效制止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串连。其二，不少农村学生去县外搞串连，也是造反运动暂时停滞的原因之一。在 8 月，学生主要从城市向农村移动，但在上述 9 月 5 日中央号召各地学生赴京交流经验，并免费提供食宿、交通等之后，由农村向城市移动的学生大增。许多学生远赴县外，这在当地县干部看来，等于把不听话的学生赶了出去，起码在最初一定是庆幸的。其三，进入 8 月下旬，全国兴起“破四旧”⁶⁵⁵运动，攻击对象由“走资派”变为“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⁶⁵⁶，这使学生的目光暂时离开了党的领导干部（走资派）。

⁶⁵¹ 此点承教于 A·华尔德，特此致谢。

⁶⁵² 8 月发生造反的 26 县中，时间明确者 19 县，其中发生在 8 月 18 日以后者为 17 县，占 89%。

⁶⁵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中发[66]478 号，1966 年 9 月 14 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⁶⁵⁴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发[66]612 号，1966 年 12 月 15 日），收于前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⁶⁵⁵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⁶⁵⁶ “五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牛鬼蛇神”指“剥削阶级”出身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除曾在反右、社教等政治运动中被处罚的干部外，准确地讲不含“走资派”在内。

V.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造反运动第二次高潮（1966年10~12月）

10月初，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10月3日发行的《红旗》第13期刊发社论⁶⁶⁷指出，“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仍然非常尖锐，非常复杂。极少数人采取新的方式欺骗群众，抵制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用挑拨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实现他们的目的”；还要求犯有“路线错误”的人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对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要公开平反”。⁶⁶⁸

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偏远地区的造反运动结合起来的，仍是红卫兵的串连。如上所述，造反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主要是学生由西安到近郊各县去煽动起来的，而在第二次高潮中，西安的学生对运动向偏远地区的扩散，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表3）。例如，在地处秦岭山脉东部的洛南县，10月29日，曾在参加该县社教运动时受到批斗的西工大的教师和学生各一人喊着“打回洛南去，彻底闹革命”的口号，带着400多名师生来到这里。⁶⁶⁹他们除贴出“炮打洛南县委”、“打倒李伟（县委书记）”、“打倒袁生玉（代理县长）”等标语外，还要求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教总团作自我批判，为西工大师生恢复名誉。在位于西安市以北约250公里的有名的革命圣地延安县（今延安市宝塔区），9月已有西安学生陆续到达。进入10月后，他们说服党政机关中下层干部，试图形成从内部造反的榜样。⁶⁷⁰后来，攻击矛头就指向被认为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党委，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炮轰延安地委”、“炮轰延安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横幅、传单和大字报。

较之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时西安学生的串连更为有组织。11月，西安交大、西军电、西北农学院等的红卫兵组织“北上点火队”，前往西安以北约170公里、去往延安中途的洛川县煽动造反。⁶⁷¹学生贴出批判县党委书记刘新怀的大字报，并煽动县内造反派在街头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洛川县委”等标语。陕西省南部各县，也有西安大学生组成的“南下造反团”、“南下串连团”进行煽动。⁶⁷²11月至12月间，西安学生在西安以北300~400公里的绥德、子长、安塞以及南方200公里的白河县等省内各地，都挑起造反。

10月以后，除西安学生外，外出交流经验后返回的当地学生，是形成第二次造反高潮的另一动力。从农村外出的学生，分为县当局正式组织的团体和非正式团体两部分，但他们返乡后所扮演的角色类似。比如，在渭南地区华县，最早开始造反的是曾被县当局派往北京的学生和教员。学生代表555人、教师代表54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1月底返回时受到敲锣打鼓的迎接，县党委、县人委的领导们都来听取他们在首都得到的“文革经验”。但第二天，街上就贴满“砸烂旧二委（县党委和人委），彻底闹革命”的标语、大字报，看着这些，领导们束手无策。⁶⁷³

如前所述，党中央、国务院在9月5日发出通知后，那些不听话的学生纷纷远赴外地，

⁶⁶⁷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红旗》，第13期，1966年10月3日。

⁶⁶⁸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红旗》，第14期，1966年11月1日。

⁶⁶⁹ 洛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洛南县志》，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⁶⁷⁰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5页。

⁶⁷¹ 洛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洛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⁶⁷² 岚皋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岚皋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8页。平利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利县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洋县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865页。

⁶⁷³ 前引《华县志·“文化大革命”志》（编著者不详，未刊稿），第10-11页。

县领导们当时或许都松了口气。但到 10 月，学生们开始返乡，县领导们才发觉问题更加严重。学生们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抄写、带回了在沿途各地收集的传单、大字报，还带回了城市红卫兵使用怎样的大字报、如何批斗领导干部等“斗争经验”。⁷⁴当地学生回乡后在县内首先造反的事例，另外还有 5 件。

该时期，到各县的红卫兵人数激增，他们不仅来自北京、西安，还有全国各地的学生。据记载，1966 年底，几乎所有县（95%）都有外县红卫兵，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外省。⁷⁵尤其是“革命圣地”延安，县外红卫兵多达 20 万人，周围县和交通要地都有许多学生。另外，与外省接壤的县也有许多学生自外地赶来。如与内蒙古交界的榆林地区神木县，内蒙古农学院的红卫兵于 1966 年底来到此地。他们认为神木县的文革“搞得太稳”，于是煽动神木中学学生组织造反团体（“卫东公社”），还召开“炮打县委司令部大会”。⁷⁶与甘肃省接壤的汉中地区略阳县，也有兰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生不断涌入，并煽动对县党委、人委造反。⁷⁷红卫兵所到之处，与“观点相近”的学生、居民建立联系，煽动攻击当地政治领导人。⁷⁸至 1966 年底的三个月内，红卫兵在省内到处活动，致使各县的政治状况迅速失去稳定。

如上所述，10 月至 12 月，三部分红卫兵——扩大了行动范围的西安大学生、返乡的当地学生和全国各地红卫兵——合流，形成第二次造反高潮，发生对政治领导人造反的县也新增 29 个（表 1）。至 1966 年底，在省内 86% 的县，县党委受到造反的冲击。造反波及范围，第一次高潮时平均距西安 156 公里，而第二次高潮则扩大约 80 公里，平均距西安 235 公里。第一次高潮时，三分之二的造反发生在交通较便利的关中平原，而第二次高潮时，约 80% 的造反发生在陕北高原或秦巴山地。可见，从第一次高潮到第二次高潮，造反运动从城市近郊依次向偏远地区扩大。

关于造反的原因，与第一次高潮一样，第二次高潮时，县外学生的煽动也占过半（表 2）。而新出现原因，即外出交流经验返回的当地学生煽动造反的也有 5 件。合计县外学生和返乡学生煽动的造反，约占总数的 70%。因此，可以说，发生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大部分造反，都是由串连引起的。此外，第二次高潮时，几乎不见当地学生直接（不借助县外红卫兵）呼应中央动向而造反或“自发”造反。由此可见，较之城市近郊，在偏远农村，通过媒体宣传或诉诸学生的自发意识更加困难。

观察县外红卫兵移动的足迹，由西安红卫兵引起的造反占压倒多数，占 12 件；其他则汉中 2 件、北京 1 件、北京以外其他省市 2 件。该时期，随着造反运动中心由城市近郊移至偏远地区，北京红卫兵来到当地煽动的事例减少，而西安红卫兵的活动则在组织、计划方面有所加强，在运动向偏远地区扩大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北京以外其他省市学生煽动的有 2 例，表明自 1966 年秋天至冬天，随着红卫兵行动范围扩大，运动的扩散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VI. 结 论

⁷⁴白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白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634 页。黄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陵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 年，第 758 页。

⁷⁵县志中，只有县外红卫兵与重大事件有关时，才记述这些红卫兵来自何处，故有外省红卫兵的县实际上应更多。

⁷⁶神木县志编权委员会编《神木县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年，第 411 页。

⁷⁷略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略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387 页。

⁷⁸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824 页。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554 页。

上文以陕西省各县为例分析表明，造反运动是由城市向城市近郊、再向偏远地区逐步扩散的，而在此过程中，红卫兵的串连曾起到主要作用。关于本文开头所示三个印象或假说——群众社会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网络——，县志所载数据表明，其所旨在把握的造反运动，也主要是通过串连这一网络构筑机制而实现扩散、扩大的。随着造反运动由第一次高潮扩大到第二次高潮，串连的作用也愈益显著。这显示，若没有红卫兵的“中介”，造反运动是不可能扩大到偏远地区的。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用群众动员方式攻击和肃清地方权力，那么，可以说其实现方法就是串连。

但是，造反并非全部起自城市红卫兵的煽动，在本文考察的两个时期内，内发因素引发的造反也占 10~20%（表 2）。内发性造反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地学生两类人发起。考虑到干部造反在两次高潮时期都占约 10%，不妨认为其发生总有一定比重，而与距城市远近等地理条件没有关系。这应与干部较学生或其他非精英集团更易获得信息有关。在部分县，中下层干部乘机从党政机关内部造反，他们或张贴大字报，或批斗上司即县委书记、县长等。⁷⁹还有一些造反，其原因似乎在于干部个人之间关系不睦或怨恨。⁸⁰总之，从县志记述看，干部造反的动机似有机会主义和个人怨恨两种。⁸¹但这些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存在，且无规律可言；而为何在文革之初的这个时期演变为公开冲突，则不知其详。换言之，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个人怨恨、机会主义与中央的宣传和红卫兵的“中介”等外发因素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县志还记载了当地学生自发造反的事例——尽管较干部造反更少——，都是在没有县外学生煽动的情况下，当地学生与工作组之间的对立发展为对相关责任机构即县党委的造反。北京大学生曾围攻负责派驻工作组的中央部委，⁸²西安大学生也曾以同样理由将批判矛头指向省党委。与这些发生在城市的事例类似，在部分县，学生与工作组之间的冲突也“内发地”演变为向县党委造反。但是，此类现象只有 4 例记述，其中 3 例发生在 8 月（表 2），故可视作城市及其近郊的特殊现象。较之农村，城市近郊似乎通过某种途径更快地得到了有关工作组遭到否定的信息，这似乎是工作组、县党委较早受到冲击的原因之一。地处偏远的县，几乎看不到此类“内发”性造反，基本上都是当地学生受城市红卫兵煽动才开始造反的。总之，内发性原因和通过媒体直接动员“群众”，都不足以充分说明造反运动如何扩散。而如本文所述，红卫兵发挥“中介”作用，才是造反运动扩散至偏远地区的核心原因。

⁷⁹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924 页。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镇安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638-639 页。另外，也有社教运动干部及积极分子造反的事例，如宝鸡地区麟游县。在外县参加社教运动，似使中下层干部得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可获得信息，促进了造反派的形成。麟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麟游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16 页。

⁸⁰前引岚皋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岚皋县志》，第 588 页。

⁸¹此处所谓“机会主义”，指集团或个人利用政治形势变化谋取其狭隘利益的思想或行为。在现实中，机会主义和个人怨恨是无法分割、相互联系的。

⁸²前引 Walder,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pp. 451-453.